

校園霸凌的影響因素分析研究

－ 以中國江蘇省揚州市青少年為中心 －

祁杰*・許昌德**・張欣晨***

· 目次 ·

I. 緒論	IV. 分析結果
II. 理論背景	V. 結論
III. 研究方法及分析處理	

关键词：校園霸凌，中國青少年，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個人心理因素

I. 緒論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作为處於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时期的青少年，其校园霸凌事件發生的頻率越来越高(顧相君，林娜，2014)。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潛在力量。然而，青少年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概率日益飆升，涉及到的學生年齡層也在不斷下降，嚴峻情形不容小覷。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校園暴力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顯示，2015年各級司法機關共接收校園霸凌相關案件超過1000起，其中施暴者為青少年的案件總占比為64.87%。其後兩年比例雖有所下降，但總占比依然超過60%。另外，根據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7)關於北京市小學及初中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6.1%的學生每天都會遭

* 第一著者，韓國嶺南大学 社會學科 博士(qj01022908866@gmail.com)

** 通訊著者，韓國嶺南大学 社會學科 教授(cdpoet@ynu.ac.kr)

*** 共同著者，韓國嶺南大学 社會學科 博士(cheung9009@126.com)

受到身體上的侵害，11.6%的學生每天都會遭受言語上的侮辱。姚建龍(2017)在關於中國中小學安全風險防控機制的研究中，抽樣調查了中國29個縣、區104834名小學及初中學生結果的顯示，全國小學及初中的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率為33.4%。由此可以推斷，校園霸凌事件在青少年群體的發生頻率較高。

從媒體報道的校園霸凌事件中可以看出，有75.0%的校園霸凌事件發生在中學生之間(初中生占比32.5%，高中生占比42.5%)，而大學生(職校生)占比為22.5%，小學生僅占比為2.5%(史佳禾，2017)。根據海南網(2016)的報道顯示，金海市某中學發生一起施暴者連續三天毆打同一名女學生的事件¹⁾。新華社(2018)的相關報道顯示2018年1月10日湖北省嘉魚縣中學一名男性學生，與同班女同學發生爭執且導致肢體衝突，並將毆打女同學的視頻上傳至網絡，引起網絡輿論的譴責²⁾。無獨有偶，江西省隴西縣公安局對2019年4月23日對發生在轄區內的一起校園霸凌事件進行了通報，通報指出隴西縣渭河中學五名學生因日常瑣事對一名學生施暴最終導致被害人死亡³⁾。由此可以看出，現今中國的青少年校園霸凌現象的危害已經難以言喻。其校園霸凌事件的主導者也正在向低齡化發展。因此，針對中國校園霸凌事件及解決對策的研究已經刻不容緩。

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校園霸凌是由於青少年的個人心理因素、家庭、學校等多方面的複合影響所導致的結果(Herrenkohl, T. L. 외, 2000; 김규학, 2013; 김창근 외, 2010)。首先，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身體與心理在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也承受著較大的課業與升學壓力。這就導致了他們的情緒相對脆弱，對周圍的事物也更加的敏感，行為方式更加情緒化。其次，家庭是青少年人格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場所，同時家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青少年的性格，因此，作為培養青少年人格與性格的搖籃，其對青少年是否出現校園

1) 『海南網』. 2016.05.22. 「琼海长坡中学3天2起校园欺凌事件-女生打人视频网上疯传」, http://hainan.ifeng.com/a/20160521/4572729_0.shtml 檢索日: 2021年4月15日。

2) 『新華網』. 2018.01.06. 「湖北嘉鱼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当地已介入调查」, <http://xinhua-rss.zhongguowangshi.com/284/-5892702754389162969/3004651.html> 檢索日: 2021年4月15日。

3) 『新民晚報』. 2019.04.30. 「陇西校园暴力霸凌致死案」,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2217830833106141&wfr=spider&for=pc> 檢索日: 2020年4月15日。

霸凌行為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影響(김정옥, 1984:114)。即, 家庭因素會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及性格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最後, 從學校層面來看, 青少年在學校提高知識水平的同時, 身體、精神、心理等各個方面也會獲得不同程度的成長。學校作為青少年學習、成長場所的同時也是誘發校園霸凌事件的主要場所之一。根據김선희, 김경연(2001)的研究結果顯示, 學校環境的好壞、教師的教學方法是否得當、課業壓力等問題都會對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綜上所述, 誘發校園霸凌現象的因素眾多因素中, 個人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都會影響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但是, 相較於國外而言, 中國對校園霸凌問題的研究依然處於起步階段。因此, 中國對於青少年校園霸凌現象的研究十分迫切。

本研究將以中國青少年為研究對象, 探索其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個人心理因素對與校園霸凌現象的影響, 旨在預防青少年校園霸凌現象及促進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 並針對校園霸凌問題提出有效的建議。希望通過本研究使中國社會各界對於校園霸凌事件予以充分的重視。基於以上討論,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 1) 中國青少年的個人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與校園霸凌之間是否存在關係。
- 2) 中國青少年的一般性人口學特徵在個人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及校園霸凌中是否存在差異。
- 3) 中國青少年的個人心理因素、家庭因素與學校環境因素對於校園霸凌是否產生影響。

II. 理論背景

1. 校園霸凌

校園霸凌是指行为人对在校师生实施的身体上的和心理上的暴力行为。姚建龍(2008)將校園霸凌定義為以在校學生為對象，其好友、同窗或老師對其進行的毆打或其他攻擊行為或對其財產造成損害的行為。而晁陽(2009)則認為，發生在學校內外、學生之間、學生與教師之間、以及其他社會人員對在校學生及教師進行的暴力行為，都應被定義為校園霸凌。西方學者 Olweus 于 1978 年第一次提出用 “bullying” 代指校園霸凌現象。并指出校園霸凌分為直接性與間接性的兩種形式。即，直接性校園霸凌為毆打、脅迫、恃強凌弱等攻擊性行為。間接性校園霸凌為對被害人精神、心理造成傷害的行為。例如，有組織、有預謀的將被害人孤立于集體之外的行為(Olweus, 1978)。另外，夏玉蓉、余吉生(2005)認為校園霸凌具有分散性與團體性、偶然性與預謀性、報復性與殘忍性等特點。이유진(2019)認為校園霸凌具有力量不平衡性、反復性、意圖性三個特點。

根據諸多學者所提出的校園霸凌定義及特點的不同，其校園霸凌的基本類型也有所不同。Olweus(1993)將校園霸凌分為身體性暴力、語言性暴力(起外號、辱罵等)、情緒性暴力(排擠、孤立、惡作劇等)以及性暴力(性騷擾、戲弄等)等四種類型。김준호 외(1996)將校園霸凌的分為語言與心理性暴力、身體與物理性暴力、因仇恨產生的暴力、工具性暴力、性騷擾及性暴力等。도기봉(2007)則將校園霸凌分為語言性暴力、身體性暴力、集體孤立行為、心理性暴力等。郭開元(2014)與李劼(2017)將校園霸凌的類型具體分為語言性暴力、身體性暴力、心理性暴力、勒索或損壞財物等。由此可見，語言性暴力、身體性暴力、心理性暴力、勒索或損壞財物，這四種分類的校園霸凌類型是最為見的。即，語言性的暴力為學生間的語言威脅、語言侮辱以及頂撞教師等行為。身體性的暴力為施暴者通過毆打等方式，對被害人的身體造成一定程度傷害的行為。心理性暴力為施暴者通過辱罵、威脅、起外號等方式對被害人造成心理及精神上的傷害等行為。勒索或損壞財物為故意損壞

或拿取學校或他人的財物等行為。

綜上所述,校園霸凌不僅會侵害青少年的身體,並且,諸如語言、心理以及性暴力更會對青少年的心理及人格的形成造成不可預期的影響。特別是兒童時期與青少年時期,極小的暴力行為都可能演變為日後嚴重的犯罪行為,究其原因,青少年群體在成長過程中,容易受到周邊環境的影響(張欣晨 외, 2018)。由此可見,青少年的校園霸凌現象更需要受到社會的關注。

青少年正處於生理與心理快速發育和變化的階段中,加之學業的壓力與對未來的迷茫,也變相增加了青少年群體生理及心理上的負擔。因此,這一時期的青少年會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且情緒十分脆弱。根據이유진(2019)與Rigby & Slee(1993)的研究結果顯示,由於青少年具有壓力大、叛逆、敏感、極端等青春期的典型性心理特徵,會導致其產生衝動性的暴力行為。並且,學校環境、教育方式、人際關係及性格養成、社會價值觀等問題,也是導致校園霸凌現象的催化劑。另外,校園霸凌現象嚴重影響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給家庭和睦、學校穩定、社會和諧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特別是這種現象的發生與青少年的自身特徵、家庭因素、學校環境等有著極大的關聯性(趙倩, 2020)。故而言之,在對中國青少年霸凌現象的研究中,需要以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及個人心理因素為中心進行綜合性的分析。

2. 家庭關係因素

家庭生活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態度及教育方式等,都會對青少年的性格形成及行為方式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魏森, 2018; 고혜식, 2006)。這是因為,處於成長階段的青少年會通過模仿和學習父母的行為來完成自己最初的社會化過程。根據胡大奎(2017)與유석인(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教育會對青少年的校園霸凌現象的產生有著直接影響。胡大奎(2017)將家庭因素分為是否為單親家庭、家庭經濟水平、是否有家庭內的暴力經歷、家庭教育、養育態度等因素。除此之外,學校因素、區域社會因素、個人因素也會對青少年的校園霸凌現象產生影響。

另外,根據고혜식(2006)、장금순(2005)、박정원(2020)的研究結果顯示,家

庭因素一般由父母養育態度、家庭內暴力經歷及家庭經濟水平等因素所構成。首先，父母的養育態度是指父母對子女學業及生活的關心程度、父母和子女間的相處方式。장금순(2005)的研究結果顯示，持權威性養育態度的父母，與持相對民主的養育態度的父母相比，子女產生校園霸凌現象的比例更高。對此，提出了採用相對民主且溫和的教育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子女性格中的攻擊性的建議。由此可見，父母的攻擊性反應(拒絕態度、武斷性的訓育等)，會對孩子造成心理上的傷害。反之，父母採取更加溫和的教育態度、加強與子女間的關係提高子女與父母間的紐帶感，子女產生校園霸凌現象的可能性就越低。其次，家庭內的暴力經歷，也是誘發校園霸凌的因素之一。長期經歷父母間的矛盾與暴力的青少年，與其他青少年相比，在學校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更高(임신일, 이정미, 2013; 감소명, 현명호, 2004)。最後，從家庭經濟水平與暴力的關係的角度來看，家庭及父母經濟上的貧困，會導致子女在物質及心理上的挫折感和自卑感，也會誘發校園霸凌現象的產生(곽병옥, 2011)。金亨燮(2012)則認為，如果父母出現事業失敗、被解雇等經濟問題，往往會導致家庭關係惡化，間接性導致家庭成員的越軌行為的增加。特別是在中國，由於單親家庭、留守兒童家庭(祖孫家庭)、農村家庭等經濟水平相對較低的家庭數量較多(顧相君, 林娜, 2014)，這些家庭的青少年受到的校園霸凌現象的幾率更高。

3. 學校環境因素

學校環境會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김대화, 2018)。學校不僅要提高學生個人潛力及智力水平的教育功能，還應為學生提供安全保障和福利，成為同時追求全面教育和學生福利的雙重目標的社會公共機構。由此，學校在學生的性格形成及社會化的進程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姚建龍, 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在以成績為唯一衡量標準的中國教育模式中，成績相對較差的學生也更容易被教師所忽視。此類學生為了恢復受損的自尊心以及引起教師和同學的關注，往往會比其他學生更容易出現越軌行為或使用暴力(李劫, 2017)。根據魏森(2018)、김미영(2007)、노충래, 이신옥

(2003)的研究顯示,學校環境因素,是導致校園霸凌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並將學校環境因素細分為教師對校園霸凌的態度、學校環境(教學樓、教學設施等)、朋友是否存在越軌行為等。

首先,教師對校園霸凌的態度是指,教師對校園霸凌所持有的態度。根據이덕난(2010)的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持消極態度,會對校園霸凌受害者的保護也相對懈怠。這將會導致被害者往往選擇不向教師舉報被害經歷。與此同時,教師的態度也變相的降低了施暴者的施暴成本。甚至,有部分教師認為,語言及心理性暴力並不屬於校園霸凌(魏森, 2018)。另外,教師作為學校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對學生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即,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造成的負面影響(如體罰、語言侮辱等),可能導致低年級學生在心理上產生焦慮與壓力。也會導致高年級學生與教師間的矛盾被激化,進而導致教師與學生間的校園霸凌行為的出現(張雙岩, 2019)。

其次,學校環境是指,學校建築的功能性、教室、運動場等設施的空間布局或大小等物理環境特徵以及學校的政策、規則、人際關係、學校的氛圍等(Moos, 1991)。即,學校環境是由學校的自然環境,教室、體育場等教學設施的功能性,與教師、同學間的人際關係以及學校的氛圍等,多個層面有機結合、互相關聯的概念。因此,當學生對其中任何一部分的感受及滿足度降低時,都會對校園霸凌行為產生影響。此外,暴力事件頻發的學校都具備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相對陳舊且功能性不健全的教學環境(한국형사정책연구원, 1993)。綜上所述,校園環境因素對於校園霸凌現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即,學生對學校產生的厭惡感、對學業努力產生的無價值感以及師生間的矛盾等負面情緒,都會導致青少年越軌及暴力行為發生的幾率增加。

最後,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時間或地點都有可能觀察並學習暴力行為。特別是在學校環境中,大部分學生會與有過校園霸凌行為的學生產生交集。根據Warr & Stafford(1991)的研究表明,經常與有過校園霸凌的朋友接觸的學生會對越軌行為的發生產生極強的認同感。即,當青少年所結交的朋友中,有人存在校園霸凌行為的話,便會增加青少年校園霸凌現象的發生幾率。另外,鄭麗(2018)研究結果表明,部分在校學生還會參與具有暴力性質的團體,並會包庇或旁觀成員的施暴行為。這類青少年在將來成為校園霸凌施

暴者的可能性極高。

4. 個人心理因素

絕大多數人都具有一定的攻擊性。但是，一般情況下由於自身良知和道德標準的存在，使其自我控制能力得到強化，從而不會輕易的使用暴力。相反，具有明顯暴力傾向或反社會行為特徵的人群，其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更高，且在實施暴力行為後，也不容易感到苦惱或是罪責感(청소년 폭력예방재단, 2012)。由於青少年的自我調節能力較弱，且其道德與倫理意識尚未完全形成。因此，相比成年人，更難感受到暴力或越軌行為後產生的羞恥心與罪責感。從而加重了青少年群體校園霸凌現象的發生率(김범수, 2009:42)。根據 김도희(2019)、김대화(2018)、이윤희, 김은영(2019)的研究結果表明，個人心理因素作為誘發校園霸凌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作用是不容小覷的。個人心理因素主要可以分為衝動性、攻擊性、對使用暴力的態度等三個方面。

首先，攻擊性是指對他人進行生理或心理傷害的意圖或行為(오인수, 2010)。具有較高攻擊性的人，其行為模式一般都以自我為中心，並且其行為受社會秩序與既有規則的影響更小(김창균, 임계령, 2010)。另外，根據 Olweus(1993)的研究結果顯示，曾經有過校園霸凌施暴經歷的青少年，截止到24歲時，犯罪行為的發生率會比一般青少年高出四倍之多。由此可見，具有較強攻擊性的青少年，隨著其不斷成長的過程，其攻擊性也會越來越強。其次，衝動性作為校園霸凌施暴者普遍存在的特點，對校園霸凌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具有衝動性特徵的人，在作出判斷或行動時容易被自身情緒左右，缺乏沉著冷靜的思考能力和自制力(이인혜, 2002)。如果青少年不能有效控制自身的衝動性，就極易導致憤怒情緒的產生，在發生矛盾時，也更容易選擇暴力的手段解決問題(劉一凡, 2020)。最後，隨著社會文化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電影、電視劇及文化產品中的暴力元素不斷增加。加之，通信技術的不斷發展，青少年群體與過去相比，也更容易受到此類文化產品中暴力元素的影響(Maeda, 1999; Sherer & Miller, 2004)。最終潛移默化的導致青少年對於校園霸凌現象的態度發生變化。

III. 研究尺度與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數據為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間韓國嶺南大學社會學科所實施的“中國青少年校園霸凌現象調查”資料。該調查旨在研究中國青少年的校園霸凌的影響因素。根據先行研究，選擇個人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為自變量，校園霸凌為因變量。本研究以採取抽樣調查的方式，中國江蘇省揚州市初、高中在校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紙質問卷的形式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間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423份，其中有效問卷399份。另外，控制變量由性別、成績、父親學歷、母親學歷、家庭經濟水平五個問項所構成。本研究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如〈表 1〉所示。

〈表 1〉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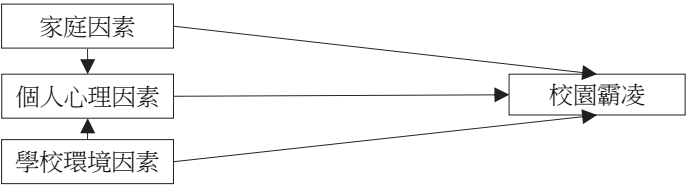
項		N	%
性別	男	169	42.4
	女	230	57.6
成績	優	43	10.8
	一般	254	63.7
	差	102	25.6
父親學歷	無學歷	5	1.3
	小學畢業	22	5.5
	初中畢業	131	32.8
	高中畢業	157	39.3
	大學畢業	80	20.1
	研究生畢業	4	1.0
母親學歷	無學歷	8	2.0
	小學畢業	32	8.0
	初中畢業	157	39.3
	高中畢業	144	36.1
	大學畢業	55	13.8
	研究生畢業	3	0.8

項	N	%
家庭經濟水平	十分優越	3
	優越	28
	一般	323
	貧困	35
	非常貧困	10
總計	399	100

如〈表 1〉所示，被測對象男性為169人(42.4%)，女性為230人(57.6%)；成績為優的43人(10.8%)，成績一般的254人(63.7%)，成績差的102人(25.6%)；父親無學歷為5人(1.3%)，小學畢業為22人(5.5%)，初中畢業為131人(32.8%)，高中畢業為157人(39.3%)，大學畢業為80人(20.1%)，研究生畢業為4人(1.0%)；母親無學歷為8人(2.0%)，小學畢業為32人(8.0%)，初中畢業為157人(39.3%)，高中畢業為144人(36.1%)，大學畢業為55人(13.8%)，研究生畢業為3人(0.8%)；家庭經濟水平十分優越為3人(0.8%)，優越為28人(7.0%)，一般為323人(81.0%)，貧困為35人(8.8%)，十分貧困為10人(2.5%)。

2. 研究模型及測量

本研究以中國江青少年為被測對象，以中國青少年的個人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對校園霸凌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由此，變量的設定為個人心理因素、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為自變量， 校園霸凌為因變量，被測對象的性別、成績、父親及母親學歷、家庭經濟水平為外生變量。具體的研究模型如下所示。



<圖 1> 研究模型

1) 家庭因素量表

本研究使用了Hudson & Acklin & Bartosh(1980)所開發的“家庭關係量表”。該量表可對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家庭氛圍及家庭成員的不安感進行測定。該量表由25個問題構成,通過信賴度分析再次檢驗的結果為Cronbach's $\alpha = .929$ 。該量表為5分Likert量表,從完全不是(1分)到完全同意(5分)五個選項構成,即得分越高,中國青少年的家庭關係因素越好。

2) 個人心理因素量表

本研究參考了도기봉(2007)所開發的“個人體系因素”量表,并根據被測對象的不同,對問卷進行了調整。該量表可對研究對象的攻擊性、衝動性、自尊心及對使用暴力的態度情況進行測定。該量表由45個問題構成,包含了攻擊性、衝動性、自尊心與對使用暴力的態度的四個維度。其中,關於攻擊性問題為19個、衝動性問題為12個、自尊心問題為9個、對使用暴力的態度為5個。通過信賴度分析再次驗證的結果為Cronbach's $\alpha = .866$ 。該量表為5分Likert量表,從完全不是(1分)到完全同意(5分)五個選項構成,即得分越高,中國青少年的個人心理因素越差。

3) 學校環境因素量表

本研究參考了도기봉(2007)所開發的“學校環境因素”量表,并根據被測對象的不同,對問卷進行了調整。該量表可對研究對象所處學校中教授對暴力的態度、周圍同學是否存在越軌行為以及所處學校的校園環境進行測定。該量表由19個問題構成,其中包括教師對暴力的態度、學校的物理環境及朋友是否存在越軌行為三個維度。即關於教師對暴力的態度問題為7個、學校的物理環境問題為4個、朋友是否存在越軌行為問題為7個。通過信賴度分析再次驗證的結果為Cronbach's $\alpha = .865$ 。該量表為5分Likert量表,從完全不是(1分)到完全同意(5分)五個選項構成,即得分越高,中國青少年的學校環境因素越差。

4) 校園霸凌量表

本研究參考了Olweus(1989)所開發的“校園霸凌加害現象量表”。該量表可對研究對象是否參與過校園霸凌及其霸凌的程度進行測定。該量表共有22個問題，通過信賴度分析再次驗證的結果為Cronbach's $\alpha=.848$ 。該量表為5分Likert量表，從完全不是(1分)到完全同意(5分)五個選項構成，即得分越高，中國青少年的經歷的校園霸凌事件更多。

3. 研究方法及分析處理

本研究使用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22.0統計工具進行分析，分析操作具體方法為，首先，使用描述性統計獲取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及變量問項的應答水準。其次，通過相關分析來掌握各個變量與校園霸凌之間的關係。再次，使用T-test及one-way ANOVA分析來獲取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各因素間的差異，並進行LSD事後檢驗。最後，使用綫性回歸分析(linear-regression analysis)探究影響中國青少年的個人心理因素及校園霸凌的影響因素。

IV. 分析結果

1. 各因素間的相關關係

本研究通過相關關係分析來探究被測對象的一般性人口社會學特徵、家庭因素、個人心理因素、學校環境因素與校園霸凌間的關係值。如〈表 2〉所示，具體分析結果為：首先，家庭因素($r=.025$, $p<.01$)和學校環境因素($r=.603$, $p<.01$)與校園霸凌存在相關關係；其次，個人心理因素($r=.500$, $p<.01$)與校園霸凌存在相關關係；最後，家庭因素($r=-.217$, $p<.01$)和學校環境因素($r=.415$, $p<.01$)與個人心理因素存在相關關係。由此可知，家庭關係、學校環境以及個人心理因素越差，被測對象的校園霸凌加害現象的程度越嚴重。另

外, 本研究中家庭因素與校園霸凌存在負向(-)相關關係的觀點與김석진(1999)的研究結果相同。

<表 2> 各因素間的相關關係

	A	B	C	D	E	F	G	H	I
A	1								
B	.035	1							
C	-.121 [*]	-.192 ^{**}	1						
D	-.039	-.092	.449 ^{**}	1					
E	.105 [*]	.152 ^{**}	-.301 ^{**}	-.266 ^{**}	1				
F	.079	.038	.059	.018	.130 [*]	1			
G	.073	-.134 ^{**}	.119 [*]	.113 [*]	-.109 [*]	-.217 ^{**}	1		
H	.059	.126 [*]	.038	.094	-.119 [*]	.415 ^{**}	-.209 ^{**}	1	
I	.058	.064	.002	.008	.127 [*]	.500 ^{**}	-.205 ^{**}	.603 ^{**}	1

A=性別; B=成績; C=父親學歷; D=母親學歷; E=家庭經濟狀況; F=個人心理因素;
G=家庭因素; H=學校環境因素; I=校園霸凌

2. 研究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各變量間的差異

1) 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校園霸凌上的差異

<表 3> 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校園霸凌上的差異

		N	平均值	標準偏差	t/F	事後檢驗 (LSD)
性別	男	169	1.452	.412	.715	-
	女	230	1.406	.373		
成績	優	43	1.379	.435	.827	-
	良	254	1.418	.368		
	差	102	1.463	.423		
父親學歷	無	5	1.645	.664	.992	-
	小學畢業	22	1.458	.372		

	初中畢業	131	1.423	.379	
	高中畢業	157	1.392	.354	
	大學畢業	80	1.461	.439	
	研究生畢業	4	1.659	.751	
母親學歷	無	8	1.335	.481	.557
	小學畢業	32	1.407	.349	
	初中畢業	157	1.450	.412	
	高中畢業	144	1.402	.370	
	大學畢業	55	1.428	.363	
	研究生畢業	3	1.681	.919	
家庭經濟 水平	十分優越(A)	3	1.378	.412	3.834**
	優越(B)	28	1.371	.291	
	一般(C)	323	1.418	.386	
	貧困(D)	35	1.411	.286	
	十分貧困(E)	10	1.890	.750	
					E) A, B, C, D

**p<.01

根據〈表 3〉所示，被測對象的家庭經濟水平對於校園霸凌具有顯著的差異影響($F=3.834$, $p<.01$)。並且從均值來看，家庭經濟水平為“十分貧困”學生的均值為1.890。即，根據事後檢驗(LSD)可知家庭經濟水平“十分貧困”的學生與家庭經濟水平“十分優越”、“優越”、“一般”、“貧困”的學生相比更容易出現校園霸凌加害行為。除此之外，在性別、成績及父母學歷上並沒有發現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

另外，本研究為探究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個人心理因素上的差異，進行了t-test、one-way ANOVA及LSD事後檢驗的運算。但根據具體結果顯示，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個人心理因素的調查中不存在統計學意義上的差異。

2) 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家庭因素上的差異

<表 4> 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家庭因素上的差異

		N	平均值	標準偏差	t/F	事後檢驗 (LSD)
性別	男	169	4.112	.559	3.426	
	女	230	4.021	.649		
成績	優(A)	43	4.257	.559	3.787*	A>C
	良(B)	254	4.068	.616		
	差(C)	102	3.955	.611		
父親學歷	無	5	4.160	.629	1.906	
	小學畢業	22	3.974	.621		
	初中畢業	131	3.974	.664		
	高中畢業	157	4.070	.602		
	大學畢業	80	4.164	.534		
	研究生畢業	4	4.670	.212		
母親學歷	無(A)	8	4.215	.657	2.242*	D>C; F>B, C
	小學畢業(B)	32	3.948	.547		
	初中畢業(C)	157	3.974	.659		
	高中畢業(D)	144	4.123	.581		
	大學畢業(E)	55	4.141	.565		
	研究生畢業(F)	3	4.760	.138		
家庭經濟水平	十分優越(A)	3	4.653	.166	6.120***	D<A, B, C, E; E>C
	優越(B)	28	4.270	.461		
	一般(C)	323	4.063	.587		
	貧困(D)	35	3.689	.816		
	十分貧困(E)	10	4.468	.397		

* $p<.05$ *** $p<.001$

根據〈表 4〉所示，首先，被測對象的成績對於家庭因素具有差異影響($F=3.787$, $p<.05$), 並且從均值來看, 成績為“優”的學生的均值為4.257。即, 成績為“優”的學生相比成績為“差”的學生, 家庭因素更好; 其次, 母親的學歷

與家庭因素存在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F=2.242, p<.05$), 即根據事後檢驗(LSD)的結果所示, 母親擁有“研究生畢業”學歷的家庭與母親擁有“小學畢業”或“初中畢業”學歷的家庭相比家庭因素更好。同時母親為“高中畢業”的家庭與母親學歷為“初中畢業”的家庭相比家庭因素更好。最後, 家庭經濟水平對於家庭關係具有顯著的差異影響($F=6.120, p<.001$), 并且從均值來看, 家庭經濟水平為“十分優越”學生的均值為4.653。即, 家庭經濟水平為“貧困”的家庭與其他家庭相比, 家庭因素更差, 同時“十分貧困”的家庭與家庭經濟水平為“一般”的家庭相比家庭關係更好。此外, 並未發現性別、父親學歷與家庭因素存在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差異。

3) 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學校環境因素上的差異

<表 5> 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學校環境因素上的差異

		N	平均值	標準偏差	t/F	事後檢驗 (LSD)
性別	男	169	1.800	.618	.440	
	女	230	1.727	.596		
成績	優(A)	43	1.609	.515	3.218*	C>A
	良(B)	254	1.738	.579		
	差(C)	102	1.870	.681		
父親學歷	無	5	1.768	.936	.907	
	小學畢業	22	1.767	.504		
	初中畢業	131	1.759	.561		
	高中畢業	157	1.708	.588		
	大學畢業	80	1.825	.657		
	研究生畢業	4	2.236	1.469		
母親學歷	無	8	1.644	.621	1.320	
	小學畢業	32	1.587	.535		
	初中畢業	157	1.744	.620		
	高中畢業	144	1.794	.559		
	大學畢業	55	1.785	.626		

	研究生畢業	3	2.368	1.770		
家庭經濟 水平	十分優越(A)	3	1.877	.955	2.893*	E)B, C, D
	優越(B)	28	1.530	.358		
	一般(C)	323	1.762	.598		
	貧困(D)	35	1.741	.551		
	十分貧困(E)	10	2.273	1.105		

* $p < .05$

根據〈表 5〉所示，首先，被測對象的成績對於學校環境因素具有顯著的差異影響($F=3.218$, $p < .05$)。並從均值來看，成績為“差”學生的均值為1.870。即，成績為“差”的學生與成績為“優”的學生相比，認為學校環境更差。其次，被測對象的家庭經濟水平對於學校環境因素具有顯著的差異影響($F=2.893$, $p < .05$)。並且從均值來看，家庭經濟水平為“十分貧困”學生的均值為2.273。根據事後檢驗(LSD)的結果顯示，家庭經濟水平為“十分困難”的學生與家庭經濟水平為“優越”、“一般”、“貧困”的學生相比，認為學校環境更差。除此之外，被測對象的性別及父母的學歷在學校環境因素的調查中不存在統計學意義上的差異。

3. 校園霸凌的影響因素檢驗

下列為針對被測對象的個人心理因素、家庭因與學校環境因素對於園霸凌現象的影響因素以及家庭因素與學校環境因素對個人心理因素的影響分析結果如下〈表 6〉、〈表 7〉、〈表 8〉所示。

<表 6> 個人心理因素對校園霸凌現象的影響

		校園霸凌			
		B	標準誤差	β	t
常數		.148	.192		.773
控制變量	性別(1=男)	-.015	.035	-.019	-.443
	成績(1=優)	.031	.030	.046	1.042
	父親學歷	.023	.022	.067	1.325
	母親學歷	-.002	.021	-.006	-.118
	家庭經濟水平	.053	.034	.073	1.564
個人心理因素		.434	.039	.492	11.163***
R2(△R2)		.259(.248)			
F		22.881***			

***p<.001

根據〈表 6〉所示，該模型擬合度為24.8%，並且，個人心理因素($\beta=.492$, $p<.001$)與校園霸凌具有正向關係。即個人心理因素越好，發生校園霸凌加害現象的可能性越低。另外，根據신성대(2017)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影響校園霸凌的因素中，個人心理因素的影響最大。即青少年的攻擊性、情緒起伏、是否存在反社會人格等個人心理因素都會對校園霸凌行為產生巨大的影響。

<表 7> 家庭因素與學校環境因素對於校園霸凌現象的影響

		校園霸凌			
		B	標準誤差	β	t
常數		.969	.203		4.763***
控制變量	性別(1=男)	-.020	.032	-.026	-.633
	成績(1=優)	-.019	.028	-.028	-.688
	父親學歷	.007	.020	.016	.342
	母親學歷	-.014	.019	-.034	-.746
	家庭經濟水平	.034	.032	.046	1.065
家庭因素		-.052	.027	-.082	-1.950

	校園霸凌			
	B	標準誤差	β	t
學校環境因素	.377	.027	.585	13.957***
R2(Δ R2)	.375(.364)			
F	33.535***			

*** $p < .001$

根據〈表 7〉所示，該模型擬合度為36.4%，並且，學校環境因素($\beta = .585$, $p < .001$)與校園霸凌具有正向關係。即學校環境越好，發生校園霸凌加害現象的可能性越低。與此不同的是，根據被測對象的家庭因素對於校園霸凌的影響分析中得出，家庭因素對於校園霸凌並不存在統計學意義上的影響。

<表 8> 家庭因素與學校環境因素對個人心理因素的影響

		個人心理因素			
		B	標準誤差	β	t
控制變量	常數	2.193	.260		8.422***
	性別(1=男)	-.047	.041	-.052	-1.131
	成績(1=優)	-.036	.035	-.048	-1.026
	父親學歷	-.028	.025	-.058	-1.110
	母親學歷	.018	.025	.038	.741
	家庭經濟水平	.053	.040	.063	1.301
家庭因素		-.100	.034	-.138	-2.929**
學校環境因素		.278	.035	.380	8.029***
R2(△R2)			.202(.188)		
F			14.183***		

** $p < .01$ *** $p < .001$

根據〈表 8〉所示，該模型擬合度為18.8%。首先，家庭因素($\beta = -.138$, $p < .001$)與個人心理因素具有負向關係，即家庭因素越好，個人心理因素也越好；其次，學校環境因素($\beta = .380$, $p < .001$)與個人心理因素具有正向關係。即學校環境因素越好，個人心理因素也越好。

V. 結論

本研究以中國江蘇省揚州市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旨在掌握其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以及個人心理因素對校園霸凌現象的影響。希望藉此為中國青少年霸凌研究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為預防青少年校園霸凌現象及促進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並針對校園霸凌問題提出有效的建議。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青少年的校園霸凌因素為個人心理因素與學校環境因素，具體研究結果如下所示。

第一，中國青少年的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個人心理因素與校園霸凌因素都存在相關關係。即，中國青少年的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與個人心理因素越好，其出現校園霸凌加害現象的可能性就越低。

第二，中國青少年的一般性特徵在家庭關係、學校環境因素及校園霸凌上的存在差異。首先，家庭經濟水平為“十分貧困”的青少年發生校園霸凌加害現象的可能性遠遠高於其他青少年。其次，成績為“優”的青少年的家庭關係要好於成績為“差”的青少年。同時，母親擁有“研究生畢業”學歷的家庭與母親擁有“小學畢業”或“初中畢業”學歷的家庭相比家庭因素更好。最後，成績為“差”的青少年認為學校環境更差。同時，家庭經濟水平為“十分困難”的青少年認為學校環境更差。但是，在本研究中，被測對象的一般性特徵在個人心理因素的調查中不存在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差異。

第三，中國青少年的個人心理因素、家庭因與學校環境因素對於園霸凌現象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首先，學校環境越好，中國青少年發生校園霸凌加害現象的可能性越低。其次，中國青少年個人心理因素越好，發生校園霸凌加害現象的可能性越低。但是，在本研究中，家庭因素對於校園霸凌並不存在統計學意義上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家長對於子女的態度、教育與其他國家相比，有著較大的差異。在中國家長普遍與子女的關係並不存在較大的爭執與矛盾。但是綜合其他國家的先行研究可以得出，影响校园霸凌的因素中，家庭因素是最为强力的影响因素。这是因为家庭因素对于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起到引导作用。

第四，被測對象的家庭因素、學校環境因素對個人心理因素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即，中國青少年的家庭因素與學校環境因素越好，個人心理因素也就越好。另外，這也可以證明，家庭因素對校園霸凌行為存在間接作用。因此，家庭因素對校園霸凌的影響依然不容忽視。

綜上所訴，中國青少年的學校環境因素及個人心理因素等變量對於校園霸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迄今為止，中國對校園霸凌問題的研究依然處於與起步階段。因此，本研究的意義在於梳理了現有校園霸凌的概念及類型，並且通過本研究結果進一步論證了中國青少年形成校園霸凌現象的影響因素。雖然，本研究中並未測出家庭因素對校園霸凌存在直接影響。但由於被測對象的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對個人心理因素存在影響的原因，可以得出家庭因素對校園霸凌行為的間接影響依然存在。以此為基礎，本研究為緩解中國青少年校園霸凌現象的發生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為預防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應當普及相關知識。在中國，校園霸凌事件多為語言侮辱、鬥毆、敲詐勒索財物等行為。但在西方國家，發生過例如槍擊等極為惡性的校園霸凌事件。因此，中國必須普及相關知識，其對象也不能只局限於學生個人，因以學校及家庭等為單位，普及校園霸凌的相關知識與教育，以防止更加惡性的校園霸凌現象的發生。

其次，校園霸凌不單單是學校環境及教學模式所導致的，校園霸凌是由多種因素疊加所導致的問題。通過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中國青少年的個人心理因素以及學校環境因素都會對青少年的校園霸凌行加害現象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學校應加強對於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注，設立專職的心理疏導教師及心理商談室。並針對校園霸凌現象設計匿名舉報機制。由此，中國在應對青少年校園霸凌現象時，應以青少年為中心，同時注重學校、學生個人心理、家庭層面所存在的不足。並通過多點結合、有機統一的方式，才能更有效地防範以及遏制校園霸凌現象的發生。

참 고 문 헌

- 고혜석. 2006. 「중학생의 학교폭력에 영향을 미치는 생태학적 요인에 관한 연구」. 한일장신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 곽병옥. 2001. 「학교폭력 실태 분석에 관한 연구」. 중앙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 권정관. 2012. 「학교폭력 실태에 대한 학생들이 인식분석에 관한 연구」. 대구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 김규학. 2013. 「청소년의 학교폭력 비행행동에 영향을 미치는 요인」. 대구한의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 김대화. 2018. 「게임화를 적용한 학교폭력 예방 프로그램 개발 및 효과 연구」. 서강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 김도희. 2019. 「음악극을 활용한 학교폭력예방프로그램이 학교폭력에 대한 허용적 태도와 대처능력에 미치는 영향」. 중앙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 김명자. 2001. 「중학생의 학교폭력에 영향을 미치는 요인」. 『정신간호학회지』, 10, 241-253.
- 김미영. 2007. 「학교체계가 중학생의 학교폭력에 미치는 영향」. 『한국청소년연구』, 18(2), 287-314.
- 김범수. 2009. 「학교폭력의 원인과 예방대책에 관한 연구」. 한남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 김선희, 김경연. 2001. 「학령기 아동의 행동문제 유형에 따른 위험요인과 보호요인의 인과모형」. 『兒童學會誌』, 22, 19-34.
- 김소명, 현호명. 2004. 「가정폭력이 집단 괴롭힘 행동에 미치는 영향: 사회인지와 정서 조절을 중심으로」. 『한국심리학회지: 임상』, 23(1), 17-31.
- 김은경. 2012. 「청소년의 사이버 불링에 영향을 미치는 관련 변인 연구」.

명지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 김준호, 박정선, 김은경. 1996. 「학교주변 폭력의 실태와 대책」. 『형사정책연구원 연구총서』, 1996(1), 13-276.
- 김창균, 임계령. 2010. 「학교폭력의 발생원인과 대처방안」. 『법학연구』, (38), 173-198.
- 金亨燮. 2012. 「학교 폭력 예방을 위한 법제 연구」. 영남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 도기봉. 2007. 「학교폭력 가해행동에 영향을 미치는 요인에 관한 연구」. 대구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 박정원. 2020. 「학교폭력의 원인 및 예방방안에 대해 교사와 학생 간의 인식 개선에 대한 연구」. 상명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 방수영, 유한익, 김지훈. 2012. 「청소년 정서행동 발달검사 표준화연구 자료를 활용한 학교폭력 피해 전국 유병률 및 관련요인 조사」. 『Journal of the Kore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23, 23-30.
- 신성대, 성도경, 이지영. 2017. 「학교폭력의 영향요인과 대처방안에 관한 연구」. 『국정관리연구』, 12, 141-168.
- 심상보. 2017. 「학생 이해를 통한 학교폭력 예방방안: 자존감과 모멸감을 중심으로」. 『The Journal of Saramdaum Education』, 11(1), 5-26.
- 오인수. 2010. 「괴롭힘을 목격한 주변인의 행동에 영향을 미치는 심리적 요인: 공감과 공격성을 중심으로」. 『초등교육연구』, 23(1), 45-63.
- 이덕난. 2010. 「학교폭력 피해학생 보호를 위한 입법정책의 방향」. 『교육법학연구』, 22(2), 145-169.
- 이유진. 2019. 「학교폭력 피해와 삶의 주관적 만족감의 관계에서 방과 후 생활유형의 잠재집단이 미치는 조절효과: 한국과 영국 비교

- 를 중심으로」. 성균관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 이윤희, 김은영. 2019. 「중학생의 교내 학교폭력 인식에 영향을 미치는 요인 다층분석」. 『학습자중심 교과교육연구』, 19(4), 1109-1130.
- 이인혜. 2002. 「기능적 충동성과 역기능적 충동성의 성격적 및 인지적 특성」. 『한국심리학회지』, 21(1), 67-89.
- 임신일, 이정미. 2013. 「남자 고등학생의 부모 간 폭력 목격 경험, 자존감, 학교폭력 피해, 학교폭력 가해의 관계」. 『학교사회복지』, 26, 27-45.
- 장금순. 2005. 「민속놀이를 활용한 초등학생 학교폭력 예방 프로그램 개발 연구」. 숙명여자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 张欣晨, 陆潭晟, 许昌德. 2018. 「家庭关系及社会性支持对青少年网络暴力的影响研究」. 『중국과 중국학』, 35, 87-116.
- 전병일. 2009. 「학교폭력실태 및 대책에 대한 학생들의 인식분석」. 한국교원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 한국형사정책연구원(1993). 「학교가 청소년 비행에 미치는 영향에 관한 연구」. 한국형사정책연구원.
- 顾相君, 林娜. 2014. 「青少年校园暴力成因及其对策」.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报』, 8(2), 83-90.
- 郭开元. 2014. 「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理论和实务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9.
- 黄胜利, 杨东平. 2017.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劼. 2017. 「中学生校园暴力问题研究」. 西安理工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刘一凡. 2020. 「校园暴力的产生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法制与社会』, 5(1), 149-150.
- 史佳禾. 2017. 「中学生校园暴力认知及家庭因素对其暴力遭遇影响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巍森. 2018. 「校园欺凌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以郑州市某两所初中为例」. 内

蒙古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夏玉蓉, 余吉生. 2005. 「论转型时期高校校园暴力类型, 特征及控制」.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学科版』, 4, 96-99.

姚建龙. 2008. 「校园暴力: 一个概念的界定」.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43(4), 12-15.

姚建龙. 2017. 「中小学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张双岩. 2019. 「初中校园暴力调研及预防研究」. 河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郑丽. 2018. 「我国中学生校园暴力现象及预防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最高人民法院. 2018. 「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 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

Espelage, D. L., Bosworth, K., Simon, T. R. 2000. "Examining the social context of bullying behaviors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8, 326-333.

Herrenkohl, T. L., Maguin E., Hill K. G., Hawkins, J. D., Abbott, R. D., Catalano, R. F. 2000. "Developmental risk factors for youth viol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6, 176-186.

Hudson, W.W., Acklin, J.D, Bartosh, J.C. 1980. "Assessing discord in family relationships". *Socialwork Research and Abstracts*, 121-29.

Olweus, D. 1978. *"Aggression in school: Bullies and whipping boys"*.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Olweus, D. 1993.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Cambridge, MA: Blackwell.

Olweus, D.1989. "Bully/victim problems among schoolchildren: Basic facts and effects of a school-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 *The development and treatment of childhood aggression*, NJ,

- Erlbaum, 411-448.
- Rigby, K. and Slee, P. 1999.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adolescent school children, involvement in bully-victim problem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uicide Life Threat Behavior*, 29(2), 119-130.
- Sherer, M., miller, O. K. 2004. "Aggressgion and violence among jewish and Arap youth in Israel". *Internal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8(2), 93-109.
- Thornberry. T., Lizotte. A., Krohe. M., Farnworth. M., Jang. S. J. 1991. "Testing interactional theory: A examination reciprocal cause relationship among family, school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82, 3-35.
- Warr, M., M. Stafford. 1991. "The Influence of Delinquent Peers: What They Think or What They Do?". *Criminology*, 29, 851-865.

〈국문요약〉

학교폭력의 영향요인에 관한 연구
- 중국 강소성 양주시 청소년을 대상으로 -

중국 사회의 발전에 따라 청소년 보호 의식이 끊임없이 강화되고 있다. 특히 최근 몇 년 중국 청소년 학교폭력에 관한 토론과 기사가 늘고 있다는 사실을 알 수 있었다. 그러나 선행 연구를 통해 지금까지 중국 학계에서는 청소년 학교폭력에 관한 연구가 매우 부족하며, 아직 연구 초기 단계에 있다는 한계가 있다. 따라서 본 연구는 이러한 한계점을 보완하기 위해 중국 강소성 양주시 399명 청소년을 대상으로, 그들의 개인 심리적 요인, 가족관계 요인, 학교 환경 요인이 학교폭력에 미치는 영향에 대한 분석하였다.

구체적인 연구 결과를 살펴보면 첫째, 사회인구학적 특성에 따른 학교폭력, 가족관계 요인, 학교환경 요인은 통계적으로 유의미한 차이가 나타난 것을 확인하였다. 구체적인 분석 결과는 먼저 가정형편이 좋지 못한 청소년들이 학교폭력 가해 행위에 휩쓸리 가능성이 더 높은 것으로 나타났다. 다음으로 성적이 좋고 어머니 학력이 높은 청소년들이 가족관계가 더 좋다는 것을 확인하였다. 마지막으로 성적이 나쁘고 가정형편이 좋지 못한 청소년들은 자신이 다니고 있는 학교환경이 좋지 않다는 것으로 나타났다. 둘째, 중국 청소년의 가족관계 요인, 학교 환경 요인, 개인 심리적 요인, 학교폭력 간에 높은 상관관계가 있는 것으로 확인하였다. 셋째, 회귀 분석의 결과를 보면 중국 청소년의 개인 심리적 요인과 학교 환경 요인이 학교폭력에 통계적으로 유의미한 영향을 미친다는 것으로 확인하였다. 이것은 중국 청소년의 개인 심리적 요인과 학교 환경 요인이 높을수록 학교폭력 가해 행위가 낮아진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본 연구는 선행 연구를 통해 다양한 학교폭력의 정의와 유형에 대한 정리하였다. 그리고 본 연구의 결과는 중국 청소년의 학교폭력을 형성하는 영향요인을 규명한 데 의미가 있다. 이를 통해 학교폭력과 관련된 지식을 보급하고 중국 청소년의 심리적 건강의 지도·강화 등을 대책으로 제안하였다. 이에 따라 중국 청소년과 교사, 부모의 학교폭력에 대한 인식을 강화하여, 중국 학교폭력에 대한 문제를 완화하는 데 도움이 되기를 기대한다. 그러나 본 연구에서 가족관계 요인이 학교폭력에 직접적인 영향을 밝히지 못한 한계점이 있다. 후속 연구에서 중국 학교폭력에 영향을 미치는 다양한 요인을 더 연구하는 것이 필요할 것이다.

<Abstract>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hool Bullying**
— Centered on the youth of Yang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 —

Qi Jie · Changdeog Huh · Zhang Xinche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the awareness of youth protection is constantly being strengthened. In particular, it was found that in recent years, discussions and articles about school bullying against adolescents in China have been increasing. However, through previous studies, studies on adolescent school bullying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re very scarce, and there is a limitation that the research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refore, in order to supplement this limita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family relationship factors, and school environment factors on school bullying targeting 399 adolescents in Yang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First,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chool bullying, family relationship factors, and school environment factors according to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of the detailed analysis first showed that adolescents from poor famil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swept away by school bullying perpetrators. Next, it was confirmed that adolescents with good grades and high mother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ad better family relationships. Final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schoo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attended was not good for adolescents with poor grades and poor family conditions. Second,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re wa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relationship factors, school environment factors, perso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school bullying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ird, the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the perso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school environment factor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hav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school bullying. This means that the higher the perso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school environment factor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lower the school bullying perpetrator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generalization of prior research and related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the school bullying of Chinese youth has been increased and demonstrated.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uggestions such as popularizing knowledge of bullying in schools and strengthening mental health guidance for Chinese teenagers. It is hoped that 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teenagers themselves, teachers and parents about bullying on campus will further help alleviate the bullying problem in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teenagers, school bullying, family factors, school environmental factors, perso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